

2702

宜石文苑

第七辑

西云阳村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宜君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会 委员会

宜 君 文 史

(第七辑)

西云阳村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宜君县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研 究 委 员 会 编

一九九二年四月

封面题字：张兴斌

责任编辑：许瑞峰

宜 君 文 史

第 七 辑

政协宜君县文史委编辑出版
西安西影彩色印刷公司印刷
陕内出批字（1990）第08911号

印数：1000册

1992年4月 内部发行

目 录

序言·····	刘树林 (1)
西云阳村简介·····	郭文卜 (4)
强自修自传·····	(5)
给强自修同志的一封信·····	张仲良 (32)
强自修同志追悼会情况的报道 ·····	《甘肃日报》(34)
强自修同志追悼会悼词·····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36)
给强自修同志追悼大会的唁信·····	中共宜君县委、宜君县政府 (39)
强自修同志永远活在我心中·····	刘树林 (40)
强自修同志和黄龙地区的革命斗争·····	李士弼、田得霖 (45)
强自修同志关心黄龙特委家属工作二、三事·····	寇 盾 (56)
回忆我的父亲——强自修·····	强虹、强涌 (59)
高风亮节——记表兄强自修·····	田鸿翔 (65)
深切怀念敬爱的四舅父——强自修·····	寇 盾 (69)
回忆强老·····	胡正源 (72)
强自珍同志生平传略·····	强祝华 (74)
强自珍同志逝世的讣告·····	国防科工委政治部 (76)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 ——忆叔父强自珍·····	强建华 (77)
深切怀念强自刚同志·····	刘树林 (83)
忆建荣·····	强 虹 (87)

强建荣同志追悼会悼词…………… 中央广播事业局 (91)

我在宜君革命活动片断…………… 刘树林 (94)

战斗在宜君…………… 刘树林 (97)

忆宜君中心区委二、三事…………… 强建华 (105)

东云阳小学师生投奔边区追记…………… 强少宇 (108)

双龙地区教导队在宜君活动片断…………… 刘如茂 (110)

深入敌后绘地图…………… 刘如茂 (113)

“铁肩支前”英名永存

——刘儒珍和宜君首期支前常备担架大队…王英选 刘瑞先 (115)

后记…………… 李忠厚 (119)

序 言

刘树林

什么地方好？娘生的地方好。西云阳村是我出生的地方，并在这里度过了我童年和少年时代。这个村子养育了我十八年，我和西云阳村是血缘关系，有骨肉之情。

一九三八年底，我离开这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学习和工作，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的 1936 年才回到宜君，一别竟过了八年。解放后我在青藏高原工作了四十年，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爱青藏高原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爱那里勤劳勇敢的各民族劳动人民，但我更爱我的第一故乡——宜君县西云阳村。

西云阳村在宜君偏桥地区是享有盛名的村庄，她的出名是有其思想，社会和历史根源的。第一，西云阳村的人民是忠厚勤劳的人民，是革命的人民，善于与四邻村庄和睦相处的人民；第二，我们这个村庄在历史上曾经出过两位名医。一位姓强，排行十一，人称一先生；另一位是兽医，姓寇，排行第五，人们叫他寇五大夫。一先生医术高明，治病认真负责，不论什么人他都细心诊断治疗，争取早日治好，减少病人的痛苦，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一先生曾经给一位红军战士治过病。这位红军战士叫刘维洲（原名刘清选，延长县人），在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他化装返回照金革命根据地，中途病倒在同官县（今铜川市），经强自修、杨培源两同志介绍，由杨建舟同志秘密护送到一先生家里。从此刘维洲同志就住在他家，吃在他家，买药还得他出钱。这在当时是很危险的事，但因为一先生是我们村老革命、老红军强自珍同志的父亲。他老人家正是出于对红军的热爱，才在白色恐怖下不避艰险。经过将近半年的时间的精心治疗，刘维洲大病痊愈，迅速恢复了健康。临走时，感谢不已。以后每见到宜君人

时仍念念不忘这件事情。这是一先生对革命做出的直接贡献，此事一直鲜为人知。寇五大夫是兽医专家，不仅周围群众的牲口有病请他治，就是慕名而来的远路人，请他给牲口治病，他也从不怠慢。经过这两位名医的手不知治好了多少人畜的病。在他们去世后五十多年的今天，西云阳村和周围村庄的人们仍在怀念他们。第三，我们宜君县早期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和宜君革命事业的开拓者强自修同志就是我们西云阳村人，我刚上初小时就听人说强自修是红军，这个传说许多人都知道。因此我们西云阳村就成了革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向往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宜君县党组织的创始人和宜君县早期的革命同志刘培植、杨建舟、王清廉、冯茂青、杨西林、薛志仁、杨昆山、杨子珍、刘世明、杨植等同志都先后来过西云阳村，有些进苏区的同志也是从这里出发的。在强自修同志未进入苏区前，西云阳村一度成了全县革命运动的中心。由于陕北红军在宜君革命活动的影响，强自修同志的努力宣传与教育，使宜君革命很快进入高潮，许多青年学生和农民中的革命分子，成批地进入苏区参加工作、当红军。成批地在当地参加地下革命斗争。我们西云阳村解放前到边区工作、参军十几个人中有五位为革命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一九四零年，由于叛徒出卖，宜君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党员被大量逮捕。但西云阳村的党组织始终没有被敌人发现破坏，也没有一个党员向敌人投降叛变革命。一直同敌人坚持斗争到解放。

这就是西云阳村之所以出名的原因所在。

西云阳村的革命斗争，曾经引起反动势力的恐惧和不安，敌人把西云阳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恨的要死。怕的要命，咒骂西云阳村是“匪窝”，“匪首”就出在这里，扬言今天抄这个家，明天抄那个的家，要杀个鸡犬不留，反动派的疯狂叫嚣和威胁并没有吓倒西云阳村的革命人民，相反的更加激起了西云阳村人民同敌人坚持斗争的决心。

西云阳村人民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付出了重大代价。

解放后西云阳村参加革命的人更多了，有的是后起之秀，我殷切期望他们继承和发扬前辈的革命传统，全心全意的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也希望西云阳村全体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人民政府，尊重党和政府的领导，任何时候都要听党的话，服从政府法令。时时事事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保持荣誉，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为国家四化建设做出贡献，使我们西云阳村共同富裕起来，生产一年比一年发展。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

《宜君文史》西云阳村专辑将要出版了，这是西云阳村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我做为西云阳村人民中的一员，写了前面的几句话。

在此我对出版专辑付出辛勤劳动的领导、编辑、撰稿、协助出版的所有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祝他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西云阳村简介

西村，原名西云阳村。位于宜君县偏桥街东北约五华里的黄土原上，东接东村（原名东云阳村），西邻西岭，南连碾子河，北靠王沟湾。距西包公路仅二、三里路。一九八四年后，与西岭、四家咀三个自然村组成西村村民委员会。全村近百户、三百八十多口人，分成两个村民小组。村中设有四年制小学一所，可供全村子女就近入学。

据宜君县志记载，西云阳村自唐贞观年间已成村庄。为了防御土匪骚扰，村里人不知什么时候在村东头沟畔上筑了一座土寨子，据说，跑土匪时，大家都躲在土寨子里。

民国初年，《宜君县详图》中，把该村记为“西云阳”村。至于西云阳村因何得名，尚待考证。

西村从三十年代起，就相继为中国革命事业输送了不少人才，到临解放前，已有强自修、强自珍、强自刚、强建华、刘树林、刘汝珍、刘志珍、刘汝茂等近十名同志参加了革命，无怪解放前敌人称西云阳村是宜君的“红军窝子”。解放后又有很多同志参加革命工作，有的已做出了让人敬慕的贡献。

郭文波

强 自 修 自 传

(1903 年—1978 年)



强自修同志遗照

1977 年摄于北京

我于一九〇三年出生在陕西省宜君县偏桥镇西云阳村一个富农家庭。

祖父兄弟三人，我祖父行二。父母生我迟，祖母生前未见上孙子，她临终前托咐我三祖母，如我母亲生了男孩，托她抚养。祖母去世后，母亲生下我。她要干农活，又要搞家务，无法照管我，就按祖母的遗愿把我托给三祖母照管。三祖母对我很好，饥饱冷暖都操心得很周到。当时是三祖父母管家，他俩是我的保护伞，我吃得开，因此从小就养成了一副孤傲的性格，不爱和别的孩子玩，也不爱打架。旁人只能说我好，不能说我坏。婶娘们不能把我三祖母叫三妈，叫了我就不依，长到十二岁，自己还不会穿衣服，一次母亲领我走外家，我才学会穿衣服，回家后被三祖母知道了，还骂我母亲懒得怕给孩子穿衣服。

二十岁开始进私塾，念的是四书、诗经、《幼学琼林》、《古文选读》等，读了不少古书。

从小性格好静，这时又读了一些书，就注意观察和思考问题。旧社会的苛捐杂税多，我叔父家里穷，我们家里富。负担捐税，他家出一块钱，我们家只出四块钱。但按财富算，我家等于他家的四十倍，我感到不公道。我们家大，亲友来往多，骑骡子压马的阔亲戚来，啥都不动手，我家就摆烟盘子，好酒好饭招待；穷亲戚来，一来就帮助我家干活，但很少见喝酒炒菜，我觉得这也不公道。同样的人，两种对待，从中看出一点规律性的东

西，究竟是什么道理，这时还没有想通。以后我年龄大了，得出一个求公道的想法，但如何才能求得公道，却经过很长一段摸索的过程。

开始学的是孔孟之道，孔孟主张的仁义道德那一套，我想如果按这一套去办，也许能得到公道，想从孔孟之道中求公道，自己也竭力身体力行。如学了颜回讲的“非礼勿视，非礼勿闻，非礼勿动”那些话，走路就走的端端的，两眼直视，不左顾右盼。见了女人，也不正面看。过了一段，书读的多了，对这些老夫子说的发生了怀疑，感到有些话不对。如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感到这纯粹是一种愚民政策，还是解决不了公道问题。

以后上了小学，开始学三民主义，觉得这些道理很好，能解决公道问题，学得很卖力，考试成绩经常是一百分，想从三民主义里找公道。当时社会上有些人看不起三民主义，把它叫做“杀民主义”，我也慢慢产生了怀疑。如：天天讲民生主义，老百姓还是穷得吃不上饭；提倡民权主义，实际上老百姓的人身自由还是毫无保障。从这些事情上也认识到所谓的三民主义，还是解决不了公道问题。

一九二三年高小毕业前后，我已是二十岁的青年了。这时接触社会比较多了，懂得的事情也多了，眼光已从自己的家庭扩展到社会上，逐渐对整个社会制度不满，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不满，不仅从理论上探索求公道，而且采取了反不公的一些行动。上高小时，学校的风气很不好，学生中也有耍赌博，抽大烟的，我们对有些教师很不满，就发动学生闹学潮，驱赶那些不称职的教师。对国民党的县长和当地绅士根本看不起，曾经写过一首打油诗形容他们是：“浆糊脑子走狗腿，近视眼镜抓钱手”。有一个绅士外号叫程疯子，是县民团总局长，他的儿子程鸿儒，和我是同学。有一次我们吵了一架，把程疯子惹下了，他写信叫我，我没去，又派人来叫我，我也未去。当时我抓住一点，我是个学生，

有什么事情应该由学校管，不该他管，拿这个理由，争取老师和同学的支持，和程疯子斗。结果还是学校出面，把程疯子叫到学校里来，我当众把他大骂了一顿，他灰溜溜的回去了。从此我在县城里出了名，人们都传说我这个人厉害。一九二四年高小毕业后，在五里镇小学教了半年书。我认为这个学校在韦半县（宜君县的大绅士）手里掌握着，名义上是公学，实际上是他的家学。我写了一个告白，揭露他操纵学校，办事不公。后半年我就不去学校了。二六年冬，家庭下降到贫农，景况很苦，连吃粮都不够，我弟弟买了一头瘦驴驮木炭，卖掉换粮吃。有一次碰上了伪县长，硬把驮东西的架子拉走，给他家去驮碗。我给县长写了一封信，大意说：“你家吃得饱，我家没饭吃，你把架子拉走，影响我们全家生活，希望能原璧归赵”。以后他把一个烂架子还来了，写了个条子：“已将原璧归赵”。从此我把县太爷惹下了，连个小学教员也当不上了。

从二五年到二六年这个阶段，思想上找不到出路，和一些官绅碰来碰去也碰不出名堂，感到很苦闷，曾产生过两种想法：一是干脆上山当土匪，专门杀官劫库打富济贫，打抱不平；一是隐居深山，开几亩地，种一点田，自苦自吃，与世隔绝，与木石居，与鹿豕游。过来过去，在这两条路中间徘徊了很长一段时间。到二六年，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其中也有曾列汉诺夫和布哈林的。看了一本“苏俄考察记”（记不清是谁写的）。看了从国外寄来的一本“寄给中国青年的十二封信”的小册子。里面有一篇叫《论摆脱》，劝人摆脱家庭等一切拖累，在斗争的道路上奋勇直前。也劝青年人一边读书，一边干活。这些书籍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启示，认为只有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去行事，才能解决社会的公道问题。其它路都走不通，同时也认为一个人要追求革命的道路，就必须摆脱一切羁绊，不受一切干扰，不惜一切地干。到了一九二七年，我的革命人生观就大体上肯定了。

但是，这时还没有找到党，我也懂得光凭一个人的力量去干

是不行的，所以就联合四个人，从一九二八年起在当地开始搞反贪污污吏土豪劣绅的斗争。这四个人有胡周臣、樊立民、杨作栋等。几个人联合起来搞斗争，第一次就胜利了。胡当上了县教育局局长，樊当上了高小教员，杨任建设局长，我当了建设局干事。胡周臣当上教育局长，就站在官绅一边去了。使樊、杨消极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尽力说服樊杨，鼓励他俩和我一起坚持斗争。我们先从内部反起，对胡采取揭露和威胁的斗争方式。我给胡写了一首“哭婆娘歌”：“我为你肝肠曾哭断，我为你心血也愁干，我为你懒把教育办，我为你灰心吸大烟，我为你侵吞教款一大半，我为你官绅林中争状元。”这首诗传出去，就把胡吓跑了，跑到乡下几个月不敢进城。还有一次，胡逼学租，把彭村佃户李进财的妻子押起来了，我知道后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胡接信后，害怕了，立即将人释放了。

当时我们也和伪县长张守顺进行了斗争。张发动当地的劣绅给自己立了一个德政碑，我们发动学生乘夜把碑掀倒，在碑上抹了一层牛屎。张守顺抽大烟，我们给他画了一幅漫画，画他一手拿烟枪，一手拿银元，嘴里喷着烟说：“本县一生两件宝，大烟银元民间找，若问娘宝孰为重，宁舍亲娘不舍宝！”我们将这幅画印成传单，到处散发。这个家伙拿着传单给警察局长看：“你看，像我不像我？”我们到处揭发他的劣迹，国民党不得不把他换了。

张守顺走后，换来的新县长是冯玉祥的军法官邓树贞。那时，给各县派的军粮很重，也可以折成银元缴款。我考虑的对策是，抗不可能，采取拖的办法。宜君县各区缴款都不积极，特别是东区的大绅士多，款最难办。伪县长邓树贞给其它各区都派了人下去催款，只有东区没派。有一天晚上他把我找去说：“你是地方人，到东区看一看，看是有粮不缴，还是无粮。”我碍于情面只好答应去。我到东区后，发现首先是以韦半县为首的大老财抗着不缴，原先多次派差人去都没催动。韦半县的家门上拴着两条大狗，去的人连门都进不去。差人们给我说，我给出了个主意：“你

们去，先用大石头把门砸了，把狗赶跑，然后，把锁链往韦半县脖项里套，看他怎么办。”差人按我的话，到韦家闹腾了一阵子。韦半县一看来硬的，就用软办法来对付，对大家说：“你们不要闹嘛！”接着给每个人都送了一小包大烟，就把人打发走了。韦半县听说我来了，两次派人来叫我，我没去。第三次找我的同学来劝我，又差人提着灯笼来请我，我一去，接待的非常殷勤，把大烟盘子摆开，亲自给我烧烟。我抽了几个泡子，对他说：“我来看看，到底给不给，如还不能，县上就准备派一团人到这里来吃。人家来找你，你还是避不过。”韦半县一听这话，就满口答应。第二天就派了四头骡子把粮送去了。把韦半县的事一办完，其它人的我再没管。当时正是三、四月天气，各处都有庙会，我整天只是看戏。这时节，其它各区都送开粮款了，东区不动也不行了。我就把区长和一些绅士叫来，把大绅士张石斋、郭丹梯大骂了一顿，末了对他们说：“这是全县的事，东区不动也不行。款要送，多少都可以，也不要多送。”他们商量了一会儿，凑了八百块现洋，我说：“多了，只要五百元就行了。”他们把款送去，我就回县上了。到县上，我给伪县长编了一套，我说：“收成不好，确实是没粮。我在乡下常吃菜，吃得拉肚子”伪县长听了说：“你虽然没完成任务，但把情况弄清了。”就这样把他哄过去了。

一九二九年，陕西省农矿厅开办训练班，由各县保送公费生，我考上了，半年后，又转为建设人员训练班，我就在这个班学习。一九三〇年底，建训班结业，学员们把文凭抓的很紧，我觉得很无聊，没领文凭就走了。三一年在宜君县当了一年建设局长，啥都没干。在这期间发生过两件事。一件是，二九年后半年，宜君有一个在西安一中上学的学生蔡元楷，找我说：“你不是找共产党，要革命吗？我们学校有个组织。”他介绍我去谈了一次话。跟我说话的人，谈的是唯物主义，说他们的靠山是张学良，又给了我一本书（也是谈唯物主义的），动员我加入这个组织，后来我从蔡元楷的言论行动上察觉到，他们不是共产党，而是第

三党，我就坚决和他们断绝来往。别一件事是三二年，孙盛威（此人我不认识）以我同学的名义从西安给我来了一封信，大意是：“自修同志，我们党在白区的整个斗争计划是五抗：即抗粮、抗款、抗捐、抗税、抗丁。请你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执行。”我收到这封信后的第二天，宜君县实行了邮政检查制度。这件事我一直没弄清楚，是党给我的指示，还是敌人给我设的圈套？

一九三三年，我被免去建设局长，闲住了一年。这时我把斗争的矛头对向伪县长张斗山。他搞什么，我就反对什么。他在大街上碰上我，老远就把眼镜取下想打招呼，我也不理睬。由此结冤很深，他想方设法地想搞我，当时宜君的驻军是井岳秀的一个团，头子叫张水楼，是个收编的土匪头子，我见他不愿搭话，他在绅士中说：“你们那个强局长，像个佛爷见人连话都不搭。”一次，这个团有个团副被土匪打死了，全县要开追悼会，张斗山在临开会前才给我发请帖，邀我作特约讲演，想捉弄我。我一上台，先说了几句悼念那个团副的话，然后话题一转，就把本腔露出来了。我说“现在人民的敌人还多，帝国主义、官僚、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是人民的敌人。只有把这些都打倒，人民才能得安生。”这些话一说完，全场为之轰动。我一想，台底下坐着一团人，弄糟了，我想跑也跑不了，随即在结尾时又把话锋一转，说道：“我们的敌人这么多，像张团长这样为民除害的军队，才是我们需要的军队，张水楼是个粗人，他一听我夸他哩，就把我前面说的都不管，只抓住后头的几句话，上台致答词时说：“这个会开的好，特别是强局长讲的话，对我们鼓励很大。”他这一说把全场的骚动情绪压下去了，张斗山的这一招失败了。但他并不甘心；又使出了更厉害的一着。有一天，他把我叫去还没说几句话，就下令把我关起来了。先把我关在木笼子里，到晚上才给了一张床让我睡觉。第二天早上，张水楼叫了一伙人来看我，我乘机把他抬了一下：我说：“张团长给我说话，我很感激，要不是张团长，我要叫张斗山认得我哩！”张水楼讲：“张斗山和强

自修脾气都暴，但张斗山斗不过强！”这么一说，就把我放了。不久敌军换防部队还没走，张水楼先走了。张斗山这时又出面了，起先他是共产党的嫌疑抓我的，因为抓不到什么证据，这时就换了另一条理由，说我给警察局介绍的一个人把一条盒子枪拐跑了（这是事实）。最后还是中区区长白俊卿从中说和，我赔了一条枪，才把我放了。

事过不久，张斗山调走，换了个麻百年。张斗山把我以共产党嫌疑罪告到伪省政府的案子还未结。麻来时就带着这个案子。他在西安就找宜君的学生问过我的情况。有个学生薛志仁，和麻的儿子是同学，关系较好，他对麻说：“强自修这个人很清白，见不得那些贪官污吏，说过一些难听话，有些人不高兴，说他是共产党是没有根据的。”麻还不放心，又找那个学校的校长了解薛志仁，校长说薛是个好学生，麻才有点相信。加之，我给建设厅长李仪祉告过张斗山一状，说我想干些事，张不支持，总想诬害我。李认为我是他办的建训班的学生。相信我说的，也认为是个冤案，给伪省政府写信，要求秉公处理。麻百年未来前，先有了这些底，到县上后，白俊卿又对他把我的事情讲了一遍，麻觉得没啥事，也就没有追究。有一天我在学校代课，麻百年来了，跟我打了招呼。他以为我很着急，要先说这件事，结果我一字未提，倒是他先提出了，我说：“希望麻县长秉公查报。”以后，麻给伪省政府呈报：“此案，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件事就这样结案了。麻百年这个人很毒辣，常给人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我对此人也有些戒备。我的案子虽然了结，但麻心里总对我不放心，每次我上宜君县城去，他总要请我吃饭，也常对我讲：陕北落后，人穷，根据地不行等等。我听了，光是笑，或低着头吃饭，一句话都不说。有一次他对我说：“你这个人啥都好，就是守法观念差。”送给我一部“六法全书”，八本黄诗医书，想叫我规规矩矩、学医看病，慢慢就不想革命了。我表面上只得应付，跟麻百年的斗争总算平稳地过去了。

经过二八年到三三年的反土豪劣绅的斗争，当地绅士便传出一阵恶风。说强自修是个亡命之徒。对他不能轻举妄动，要搞就要集中力量一下子搞死。不要打草惊蛇。反受其害。我自己的经验是：搞上层斗争，斗来斗去斗不出多大名堂。必须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发动学生和农民上，为深入开展革命打好基础。

到了一九三四年，杨星海在县第一高小当校长，教员不够，刘子修推荐我，杨不想要，嘴上又不敢说不要。只得说：“你去劝一下，我估计他不来。”刘子修来跟我说。我推辞了。以后，杨作栋又推荐我，杨星海说：“刘子修去了，人家不干嘛！”杨又来找我，我说：“要教书，就要搞些革命工作，光教书，我不干！”经过杨一再劝说，我答应去教书。到学校后，我发觉情况不对，我一上课，校长老在教室门口转哩。我跟杨作栋等人一商量，把校长的弟弟杨培元从家乡请来了解情况。他说：“我哥主要害怕把校长的职务弄掉了，其它的事情都不管。我们便请他对杨星海说：“强绝对不夺你的饭碗。”校长一听放了心，以后我上课，他再也不来了。几个月后，我们和杨星海的关系搞好了，事情也好办了。我们提出把过去闹学潮开除的十六个学生收回来，杨答应了。还给伪县政府写了报告，随后，我们就采取改名换姓的办法把那些学生都收回来了。这时，我们在学生中有了核心力量，就成立了读书会，任务是：研究社会科学书籍，宣传红军和游击队的好处；揭露国民党的面目，发展组织等，并规定了一条纪律：“绝对保守秘密，内部的事不向外泄露。”一九三四年成立读书会一年，只发展了二十多人，有关关门主义倾向。

读书会建立后，人数虽不多，但做了不少工作。我是教语文的，采用启发式教学法，尽量给学生灌输些革命道理。有时出些怪题，有时只介绍情况，让学生自己做。如出了一道题是：“穷人爱不爱吃鸡子？”通过做这道题，学生就理解了道理：穷人不是不爱吃，而是没钱吃。有一次，红军和游击队在偏桥杀了四个伪县长，满条街是血，我们就写了一张快报：“今早的好消息！”学生们